

论雷蒙·威廉斯的电视批判

何卫华^{1,2}

(1.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2.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 威廉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电视研究是他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一些创见使得他成为电视批评的先驱者之一。通过反对技术决定论等论调,威廉斯将电视的出现放在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中,证明任何技术的出现和应用都是一系列经济、政治和工业等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技术产生的结果;威廉斯认为不管是作为一项技术,还是作为文化形式,电视的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定的“意图”;此外,针对电视越来越受制于商业的压力,威廉斯还倡议采取多种形式的改革,以便使其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长期的革命”的重要资源。通过对威廉斯在这一些领域系列观点的论述,力图阐明威廉斯对电视的关注与其本人的左派政治筹划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 雷蒙·威廉斯; 技术决定论; 电视; “流”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志码:** A

英国电视广播开始于1936年,此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节目的增多,电视广播很快就成为人们重要的娱乐方式。对于这些倍遭英国精英阶层蔑视的文化形式,将其带入“严肃文化”的殿堂并进行研究,雷蒙·威廉斯无疑是开先河者之一。事实上,电视等大众传播形式很早就已经成为威廉斯的关注对象,在他早期的一些重要著述中,如《长期的革命》和《传播》中,虽然主要讨论对象仍然是以书面形式为主的传播方式,但他已经开始关注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形式。而且在1968年到1972年这四年间,威廉斯更是应好友卡尔·米勒(Karl Miller)之邀,坚持每月为英国广播公司旗下的周刊《听众》(*The Listener*)写一篇电视评论。同时,作为其时英国知识界的重要代表,威廉斯也经常受邀参加一些电视节目的录制,这些“上镜”的经历为他后来的专著《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提供了最原初的动力并积累了宝贵经验^[1-2],这本书彻底地将主要的研究对象从经典的文学文本拓展到电视这一全新的文化表达

形式。这本书之中提出的很多概念、思路和观念,在后来的电视以及传播研究之中得到了广泛的征引。威廉斯在该书中指出,不能简单地将电视视为一种视觉媒介,更为重要的是,电视也是一种文化形式。为了论述的方便,威廉斯提出了“流”(flow)的概念,用来分析电视节目的编排、分布和结构;此外,他还提出了“流动的藏私”(mobile privatization)的概念,以说明电视是一种公共性媒体,其受众足不出户就可以收看节目。本文以电视为例,结合威廉斯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以及对电视的分析展开论述,以说明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形式的电视与威廉斯本人政治理想之间的关联。

一、反对技术决定论: “威廉斯—麦克卢汉之争”

关于技术研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论调: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征兆论。前者认为,技术和社会过程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新技术的出现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前提条件,而新技术的发明,究其

收稿日期: 2013-09-12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3NDJC140YB),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WW007),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2M520879; 2013T60438)

作者简介: 何卫华(1978-),男,湖北黄冈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剑桥批评传统、去殖民化理论和英美文学。

实质是技术内部的研究和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技术研发是自发、自足和独立完成的,然后凭籍其巨大的变革力量创造出全新的社会或人类境况。各种异彩纷呈的发明造就了历史的进步,因此,历史实质上是技术的历史,技术创造了现代社会。与此相对的是技术征兆论,该观点认为技术并非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只不过是整体社会变迁的“征兆”、偶然的副产品而已,社会变革由其它原因所决定。上述两种观点都将技术和社会孤立开来,在威廉斯看来,这两种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电视等大众传播技术出现的原因。在威廉斯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正突飞猛进,人们对科技的膜拜可谓是无以复加,科技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进器。在当时的语境之中,技术征兆论并非主流,因此威廉斯批驳的主要对象是技术决定论,而这在他和麦克卢汉的对话中有具体的体现。

作为传播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家,麦克卢汉始终是威廉斯重要的对话和批驳对象。将科技看作造成效果的原因,在麦克卢汉这里可谓登峰造极。他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出版于1962年,该书提出的一些全新观念令人眼花缭乱,传统的传播观念一时间遭到了很大的冲击,这本书也因此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引起强烈震撼并被广泛讨论。在该书中,麦克卢汉指出,传播研究重心不应是内容,而是技术本身,因为“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传播技术决定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技术本身才是一切效果的根源。他高度评价了电视的民主化特征,因为观看电视无需特别训练,不管是文盲还是小孩,都能在荧屏之前自得其乐。而且在他看来,现在已经进入电子时代,人类的时空观念已经为电子媒介所重构。在电子时代,信息传递是实时的(instant),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时间(按视觉和切分计量的时间)和空间(整一的、形象的和封闭的空间)都消失了”。^[3]这种实时的信息传递,将缩小人们之间的距离,不管人们身在何方都能和整个世界保持同步,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再也无法阻止人们及时地获取来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讯息,世界从而被连接为一个“地球村”。换言之,新的媒介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人的能力的延伸”,并进而决定着个人和社会的变革和存在形式。

在威廉斯看来,麦克卢汉的这种论调,是在宣扬技术决定论。威廉斯认为任何传播,不管是技术还是内容,都要经过社会权威的选择、过滤和控制,而麦克卢汉对这些因素却置之不理。在麦克卢汉看

来,传播研究没有必要研究传播所涉及的内容;威廉斯认为,透过媒介形式和传播的内容的迷雾,去考察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才是关键之所在。在威廉斯看来,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实质上是一种形式主义,是一种维护现存社会形式的意识形态。学者贾尼斯·马尔切索(Janice Marchessault)也曾指出,麦克卢汉在理论方法上受到过利维斯和理查兹等新批评家的影响,因此,威廉斯批评麦克卢汉的立场是一种形式主义,应该是中肯的。^[4]从“威廉斯—麦克卢汉之争”可以看出,二人的关注焦点显然不同,“确定和探索媒介技术所带来的重大文化转变,这是麦克卢汉的兴趣之所在。威廉斯也在讨论新媒体,但媒体技术兴起的条件及随后对这些技术的使用和控制,才是威廉斯关注的对象。麦克卢汉完全沉浸于新技术形式(在历史上和在当下)所产生的主要文化效应,而威廉斯则试图表明,技术本身并不能保证其产生的文化和社会结果。”^[5]当然,反对技术决定论,但同时也要警惕另外一种论调,即认为科技完全是被外在力量所决定。威廉斯关于决定论的观点,可以引述在此以解释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真正的决定论涉及了整个实质的社会过程,绝不是密不透风的控制,绝不是可以预测未来的整套原因。各种社会实践都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人们在社会的行事与作为受到很大的掣肘,但又从来不至于被全盘控制。权利或资本的分配、社会力与体力上的继承,不同群体规模大小的关系,都是“设定限制”和“施加压力”的因素,但它们从来不能控制全局,也不能全部预测整个复杂活动的结局;限制之下,总有空间可以转寰,压力之下,存有反抗余地。这也是为什么威廉斯说,科技是特定社会下的效果:意向虽在控制之中,效果却在控制之外。^{[1]133,[6]163}

这同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著述中关于“决定”的观点是一致的,电视的历史在这里可谓一个很好的实例。对这场“威廉斯—麦克卢汉之争”中威廉斯的立场,朱斯特·卢恩(Joost van Loon)指出,“作为反对技术决定论的论点,这并不太令人信服,原因很简单,因为用多重因果论(multiple causality)来取代单一因果论,这本身并没有否定某种形式的决定(determination)的可能性。”^{[7]59-60}“多重因果论”这一评论很明确地指出了威廉斯对技术同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但这种指责却错误地理解了威廉斯的立场,因为威廉斯要反对的是决定论(determinism),而并非要取消决定。

总之,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社会中进行,并受制

于社会所能提供的条件;同样是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科学研究的成果才会被挑选和转化为社会中的商品。像电视这一类产品的出现,不管是作为技术还是作为文化形式,都并不是自足的过程,而是由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综合决定的,都有“意图”的参与,或者换句话说,都是“效果”。这些意图既非个人的,也非心理的,而是在社会结构中被建构的,代表着特定社会形式的经济和政治立场。尼克·斯蒂芬森(Nick Stevenson)在将威廉斯同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观点进行比较时,也指出,“在分析中,他(霍尔)过于关注意识形态,以至于忽略其它的决定层面,如对大众媒体的占有和控制。在传播结构和民主理论之间,威廉斯认为存在一种成果丰硕的辩证关系,这在霍尔这里则被忽略。”^[8]只有研究传播背后的体制、意图和利益等多元决定因素,才能将批判和超越的视野带入传播研究,而这正是威廉斯始终坚持的传播研究方法。

二、“意图”与电视的出现

对于理解威廉斯关于技术同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述,电视的出现和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首先从技术层面来看,“电视不是纯粹的技术发明,而是在多个不同的领域出现的科学和技术研究综合作用的结果。”^{[2]27}电视的出现并非单一、孤立的事件,其出现的前提是电、电报、摄影、动画和无线电等一系列复杂的发明和技术进步。由于各个领域科技的发展,在出现之前,电视实际上就已经被预见到,然后人们就开始不断寻找方法去实现这一想法。此外,从社会层面来看,包括电视在内的这些新传播技术的出现,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原因。由于军事、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扩张的缘故,以及这些新的历史现象所造成的这些体系内部的危机,也成为新传播体系发展的动力。如何解决大规模的军事和商业活动中出现的通讯和控制问题,成为了通讯技术发展早期最主要的激励因素。在社会转型期,由于流动性以及各种社会组织规模的扩大,同样要求更有效的传播方式。社会提出了新要求,但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而这些新的传播方式就是结果。政治权力的集中需要将来自中心的信息顺利传达,因此需要通畅、及时和高效的信息传播渠道,早期报纸的出现同样也是这一历史进程和需要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报刊不仅是新的传播手段,也成为了新的社会体制:

如果说是传达一般的训令,这样的传播体系

早已经存在;如果说是散播新闻与交代背景,有立场,要作预示,并且日日更新,那么教堂与学校这些传统机构是再也无法胜任了,很显然地新的形式已呼之欲出,而报纸整装齐全也就顺势待发。^{[1]14,[6]34}

总的来讲,包括电视在内的现代传播技术的出现,由新的交流需求所催生,因此和新出现的扩大了、流动的、复杂的新型社会密切相关。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更为复杂的原因。总之,新技术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系列军事、政治和工业等新的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与其说技术决定社会,不如说事实差不多刚好相反。借用琼斯的话讲,“传播方式是社会塑造(social shaping)”的结果,电视等传播形式的出现,不能完全归因于技术本身。^[9]

作为技术的电视的出现是社会的结果,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也不例外。从威廉斯对大众传播的体制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广播体制的发展绝非技术本身作用的结果,同样和社会形态息息相关。英国的广播体制更加强调“公共服务”,而美国的广播体制更为看重“商营”,这一差异就源于社会背景的差异。威廉斯认为早期电视的体制化,主要是在作为“公共服务”和“商业体制”的竞争中完成的。在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这些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新技术,如广播,被体制化的途径都各有千秋,这清楚地表明技术并非决定性因素。威廉斯认为应努力在公共服务和商业用途之间寻求平衡,但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经营电视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利润。在美国,对“独立的”大众传播的呼声很高,但其背后实际上是美国资本主义在作祟,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提供合法化声称,最终的目的是利润。从50年代开始,在这一口号下,美国传媒不断试图打破民族的疆界以便向全世界扩散。由此可见,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是新的、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和控制形式,其用途既是社会性的、商业性的,但同时也具有政治操控性。

为彰显作为技术和作为文化形式的技术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威廉斯提出了“意图”(intention)的概念。在威廉斯看来,电视等大众传播技术的研发都有明确“意图”,但在研究具体科技发展史时却通常忽略这一点。要真正理解技术发展史,就必须对“意图”进行考察。这里的意图,并非个体的意图,而是社会的意图。在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和走向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技术本身虽然会起到一定的决定作用,但社会意图也发挥着其巨大的功能。不仅科学研究的前进方向是由社会决定的,发展哪一类的技

术实质上也是社会选择的结果,任何形式的技术决定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传统的传播研究绕开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历史,由此排除了任何关于人类意图的观念。而在威廉斯看来,对更广范围的技术和社会关系进行研究时,对意图的关注应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原则。威廉斯倡导的这种传播研究模式显然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模式,而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的传播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正如约翰·费斯克所说:

过去“线性传播”(lineal communication)或过程传播所着重的“发送(sender)——讯息(message)——接受者(receiver)”的理论模型,被文化研究者完全摧毁。许多传播理论的核心理想是让传播尽其可能地更好、更有效率,而更有效率正意味着更具宰制性格,这就是文化研究质疑的地方。文化研究可以触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而传统的传播理论则想要忽略社会、历史的偶然性(contingency),以建立均一的模型,而文化研究却非常强调这种偶然性,这是他们之间冲突的原因。^[10]

对“意图”的深究,目的在于揭示电视并非是透明的、无辜的载体,而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不管是作为技术、还是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都是各种力量交织的结果,这些都需要解读。只有恢复这种社会历史的纵深感,才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察觉、洞悉和抵制隐藏在这种种新的传播技术背后的反动意图,同时也可以促进大家在面对新的传播方式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其中,以促使其朝好的、积极的方向发展。

对“意图”的忽略,同样体现在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中。现在,大众传播社会学已成为当今传播研究的正统,这类研究将传播中的“性”、“暴力”和犯罪对观众的影响作为主要课题。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他指出,传播研究就是要研究:“谁,说了什么,经由何种途径,向谁说、有什么效果?”但传播经常涉及具体的利益和意图问题,并且这些意图经常是“秘而不宣”。在威廉斯看来,效果研究必须注重对真实主体的研究,也就是说,要想研究传播效果,就必须研究其背后隐藏着的“真实的意图”。在大众传播社会学中,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过程被抽象为“社会化”(socialization),即个体学会如何成为社会成员的过程。这种研究传播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效果的方式,一开始就将社会现状认定为合理的,因此一切研究都在既定的社会

或文化模式之内,如民众对社会规范到底是遵从还是僭越。这种研究只是试图为当前社会提供合法化论证,增进对当前社会的认同度,缺乏对社会形式本身的反思,忽略社会文化和政治规范本身就是“效果”,是“既定社会秩序下形成的体制、关系和价值”,而社会形式才是任何“社会化”过程背后的、也是更深层的决定力量。因此,拉斯维尔的公式还应补上“为了什么目的”,以恢复被摒弃在外的意图。换言之,“(效果研究)必须对真实的主体(agency)进行研究,而不是其外在的形式。”^{[11]124}这样才能拨开迷雾,发现背后操控传播的力量之源和操盘手,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效果研究。

因此具体到电视对“性”和“暴力”的传播,威廉斯认为,不能停留在这些问题本身,而应该更进一步,将目光投向真实的社会本身。以暴力为例,我们的社会“反对暴力”,但悖谬的是,电视中却又大肆渲染暴力。要理解这一矛盾,必须将暴力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以政治的名义而进行的“合法的”、“被许可的”暴力行为,有时这种暴力行为的规模和程度都不可小觑;但另一方面,由于很明显的社会原因,应该谴责的则只是那些没有获得准许的暴力。如果将这一奇怪的现象仅仅归结于电视台所有者为追求利益而道德沦丧,这实际上是将问题简单化。在威廉斯看来,这种对待暴力的暧昧态度实质上是源于社会本身之中存在的矛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战争等暴力行为经常被合法化为解决冲突的合法手段。通常对暴力的研究,是针对其是否符合既定的文化和社会秩序,而无法采用一种超越的眼光,去对其背后的支持架构进行追问。换言之,对于什么构成暴力,受制于背后的一整套社会因素的操控。因此,在电视研究中,不仅应研究电视台被大公司所占有的效果和广告等节目产生的社会效果;更要记住,电视作为影响机制,是整个文化体制的一部分,对体制本身的反思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

三、电视内容分析与技术的替代性应用

作为一种强大的、综合性的知识、信息和文化的载体,相较于其之前的传播形式,在威廉斯看来,电视所表现的文化形式有着一些全新特点:首先,由于其技术优势,电视综合了先前很多种传播和娱乐形式,使其具备了新的特点,先前的公共讨论、教育、戏剧、电影、体育运动等形式,都发生了变革,以便适应电视这一新的技术形式;另外,随着能够同步地传递

声音、色彩和图像的电视这种新媒介的出现,各种新的围绕电视这种新的传播技术的文化形式也应运而生,如戏剧纪录片、谈话节目和剧情片等。分析电视所呈现的文化形式及其呈现的方式,对了解电视在社会中的功能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十分必要。

为对电视内容进行分析,威廉斯提出了“流”的概念,这一概念现在在传播领域流传甚广。“有计划的流”(planned flow),在威廉斯看来,是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的标志性特征。早期传播形式中,不管是书籍,还是戏剧或收音机,“间隔”是明显的,各个主要单元泾渭分明、各自独立;但在观看电视时,观众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体验,因为电视呈现的是连续不断的图像组合。也就是说,电视节目经过编排,单个节目都丧失了独立性,被精心地制作为整体的“流”中的一部分。所有节目,包括广告和电视预告片等各种节目形式都被编排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成为计划好了的、严丝合缝的真正的节目“流”。这种“流”俨然整体,节目之间的界限或断裂,不特别留意,观众根本感觉不到。而这种电视“流”的安排,主要在于需要通过广告实现盈利所施加的压力,因为广告收入是电视台的重要经济命脉,而高收视率意味着丰厚的广告收入。因此,在“流”的设计上,所有电视台都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地在“流”的最开端就试图用各种手法牢牢吸引住观众,另外,还通过不断播放电视预告片等手法,培养观众对该频道的忠诚度。在整个“流”之中,目的在于希望观众能够持续不断地观看,哪怕是插播广告时也不会调台。因此,这种“流”不仅是技术,更是由资本主义的商业逻辑所决定的文化形式。

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中,威廉斯还从宏观上分析了体制和电视之间的关联。威廉斯选取了五个电视频道,对节目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细致的分类比较,他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国营电视台播放的节目的公共服务色彩更为鲜明,而商业性电视台更多是在播放商业节目。在美国公共服务频道和商业广播频道中,在公共服务节目和商业节目的时间分配上,这种分化比起英国电视台有过之无不及。因此,从这些差异可以看出,不同的电视制度,对电视形态有着决定性影响。然而,不要就此认为,威廉斯推崇公共服务频道,而反对商业频道。商业电视台尽管有时庸俗不堪,但其节目制作通常会以人为本;而公共服务电视台,在制作节目时由于其浓厚的阶级色彩,有时会远离生活现实。威廉斯认为,“英国版本的公共责任,

事实上是以新说法来强调宣教牧师与教师的角色,隐藏其后的是整套支配性与规范性的意义与价值。美国版本的公共自由,等于是把广播委身于商品的买卖,而所谓的自由,一旦变成商品,就跟现存的经济不平等挂钩。”^{[1]136,[6]165}但对于电视等传播形式的操控力量,人们是有警觉的,人们可以通过关机、换台、甚至拒绝观看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有学者指出,对电视内容的分析和对技术决定论的挑战,威廉斯的根本目的是要将关于技术的讨论重新政治化。^[11]实际上,关于威廉斯的政治意图,《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结尾处的一句话说得再清楚不过:

实现有开明的、参与性民主的长期革命,在复杂和工业化社会里恢复有效的传播,这些在当代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但是,在特定语境下,以自由选择和竞争的名目,这些也可能成为反革命的工具。一些跨国公司,在相关国家和机构的支持下,更为深入我们的生活从新闻到心理各个层次,直到个人和集体对于各种不同的经验的回应方式,都局囿于它们所设定的选择之中为止。^{[1]157}

“公共服务”和“商业体制与政策”间的冲突仍在进行。在威廉斯看来,随着有线和录像技术等新技术的出现,对于重构传播政策来说,处于关键时期。有线电视、卫星传播系统、录像技术和互动电视等新技术,对超越公共服务和商业体制,发展以为共同体服务(community services)为宗旨的传播体制,提供了新的契机。对于实现开明的、参与性民主,这些新技术都是资源,但这些新技术同样可能被既有的社会体制或新的国际性商业机构收编。在讨论技术时,威廉斯就指出,任何技术研发,都是有“意图”的行为,但在技术出现之后,技术也可以产生之前不曾预见到的用途和效果。例如炸药的出现,就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被统治阶级所用,也可以被工业主使用,革命者和罪犯都同样可以将炸药用于自己的目的。因此,在谈到这些新技术时,威廉斯指出,重要的是发掘它们的替代性使用和组织方式,使其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威廉斯的建议当中,其中有一点提到社区电视。在社区电视这一种体制下,电视由各个地方共同体,以及传播机构的工作人员以民主的方式来经营管理。为避免少数人垄断电视节目的制作,今后应该成立更多的、独立的制作公司,通过签约的形式以保证他们制作的节目可以通过各种广播网络这些渠道得以播出。不同地区的电视台还可以交换节目,形成全国性电视网络。威廉斯始终强调,传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应由本地人以

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并且从经济等方面提供支持,以对抗商业集团的入侵。

四、结 语

总的来讲,社会中出现的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是由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像电视这样的技术和文化产品在当下所产生的各种效果,同样是由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在背后操控,而并不仅仅是其自身的原因。作为公共性的、但能够穿透到千家万户的私人空间的传播和文化形式,对塑造公民意识、情感和快速高效地传播信息,电视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它因此对现代社会体制的维持、加固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因此必须对其带来的危险性加以警惕。电视等现代传播技术以及由此而催生的文化形式,如果被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或新的国际性商业机构收编或控制(很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现实),将加强以往的那种自上而下、单向传播趋势,成为新的、强有力的操控手段,这也是早年困扰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梦魇。但这些新的传播技术,不仅可以将信息更高效地带到更多的人,同时也能让更多人更加便利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中来。这样它们也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利器,成为实现新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秩序的手段。对威廉斯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言,电视的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此在终极上仍然是取决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努力。对电视等新技术的积极而又富有辩证色彩的评价,如果考虑到当时来自文化界众多反对电视的声音,威廉斯的确不乏远见卓识。

参考文献:

- [1] Williams R.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4-15.
- [2] O'Connor A. *Raymond Williams on Television: Selected Writings* [M].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89: 9-12.
- [3] McLuhan M.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50.
- [4] Marchessault J. *Marshall McLuhan*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17-34.
- [5] Lister M, Dovey J, Giddings S, et al. *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77.
- [6] 雷蒙·威廉斯. 电视: 科技与文化形式 [M]. 冯建三, 译. 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 1994: 163.
- [7] Van Loon J. *Media Techn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M], Berkshir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9-60.
- [8] Stevenson, N. *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 Social Theory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35.
- [9] Jones P. *Raymond Williams's Sociology of Culture: a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63-166.
- [10] 吴锦勋. 专访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 [DB/OL]. [2013-10-30]. <http://www.zijin.net/news/xueshu/2007-9-9/n07997DB3HE7HD536K4CA.shtml>.
- [11] Allan S. *Raymond Williams and the Culture of Televisual Flow* [G]//Jeff Wallace, et al. *Raymond Williams Now: Knowledge, Limits and the Futur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11.

On Television Criticism of Raymond Williams

HE Wei-hua^{1,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Williams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television research was an important constituent part of his academic research. Some of his creative ideas made him one of the pioneers of television criticism. Williams put the occurrence of television in the complicat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proved that the occurrence and application of any technology were the result of combined action of a series of soci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y, politics and industry rather than the result of simple technology through such arguments as opposition against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whether television was regarded as a technology or cultural form, there was certain “intention” behind it. Meanwhile, as television was more and more limited by commercial pressure, Williams also advocated the reform in multiple forms so as to make it beco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in his ideal “long-term revolution”. This pa-

per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Williams's attention to television and political planning of the Left through discussions on his opinions in these fields.

Key words: Raymond William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television

(责任编辑: 康 锋)

(上接第 39 页)

Financial Crisis Warning of Petrochemical and Plastic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h Flow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New Crisis Sample Screening Standard

YU Chen-yue, XU Ji-xiao

(Business School,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China)

Abstract: With petrochemical and plastic enterprises as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rejects enterprises with rapid expansion (crisis sample screening standard) based on negative first net cash flow of business activities in combination with relevant information of not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prospec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h flow and then establishes a financial crisis warning model mainly involving cash flow indicator for 32 listed companies selected with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cash flow indicator of petrochemical and plastic enterprises contains predictive information of financial crisis; the accuracy rate of model judgment under the new screening standard reaches 75%, indicating that this standard has certain feasibility and is worth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cash flow; petrochemical and plastic enterprises; financial crisis warning; crisis sample screening standard; factor analysis method

(责任编辑: 康 锋)